

1
1987

史學 情報



中国史学会《史学情报》编辑部

1
1987

史學 情報



中国史学会《史学情报》编辑部

主 编：李 侃

副主编：林言椒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庆成 叶青谷 田居俭 李 侃

苏双碧 林言椒 陈启能 陈高华

陈铁健 潘振平

封面设计：郭振华

封面题字：刘元彦

版式设计：张嘉瑞

责任编辑：张林娜 黄金山

史学情报 SHIXUE QINGBAO 1987 年第 1 期

中国史学会《史学情报》编辑部编（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电话 551253）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北京期刊登记证第 1379 号 1987 年 3 月出版 定价 0.70 元

编者的话

本刊原是作为《中国历史学年鉴》的附册编辑的，自1932年正式创办以来，至今已出版了二十期。近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领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史学界从理论、方法的探讨到各类新课题的开拓，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学术活动日益频繁，出版物大量增加，国际史学交流迅速发展。面对这种变化着的新形势，广大史学工作者迫切要求加强史学信息的反映和传递。为了适应读者的需要，本刊从1987年第1期开始正式作为期刊出版，并对部分栏目和内容作了调整。

改动后《史学情报》仍以反映史学界的研究状况为主旨，力求扩大信息的容纳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增设了几个新栏目，如“回顾与展望”、“人物专访”、“书评”等，组织一些特稿，对史学界当前的状况和课题作综合性的评述；二是压缩原文摘的篇幅，突出所摘论文的主要论点；三是加强报导海内外的史学动态，改设或增设“学术动向”、“学会活动”、“史籍出版”、“台港史讯”、“国外史学流派及史学机构”、“国外史学家”等栏。

这样的改动是否合适，还有哪些可以增删的内容，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建议（刊物后附有读者意见表）。《史学情报》能办到今天，是与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关怀分不开的。我们愿意与大家一起，把刊物办得更好、更充实一些，为我国史学的繁荣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史學 情報

1987年
第一期

编者的话

• 回顾与展望

史学理论和史学改革	陈启能	1
略谈近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 若干变化	鲁生	7
传统文化研究展望	王和	12
期待夏文化探索取得突破性 进展	殷玮璋	14
秦汉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其 原因	宋超	17
元史研究的进展和薄弱环节	蔡美彪	21

• 人物专访

增强历史研究的主题意识	李晓白	24
——刘泽华关于历史认识论 的谈话		
进一步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	童明康	29
——苏秉琦关于辽西考古新 发现的谈话		

• 书 评

是否应该提倡旧历史哲学	彭小瑜	36
——简评《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元史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何史	41
——简评断代史新著《元朝史》		
评新编《孙中山全集》	陈 铮	43
谈谈改版后的《中国历史学年鉴》	施伟达	46



• 论点选登

史学研究不应套用自然科学理论	49	明前期耕地数字	57
运用新方法研究历史的出路何在	49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应分开来认识	58
史学危机究竟何在	50	“半殖民地半封建”提法的形成	59
经世致用是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传统	50	对近代传入的西方文化要做客观分析	59
儒学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格	51	西方传教士对近代中国教育的影响	59
鲜卑族与汉族又冲突又融合的四种模式	52	西方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均平思想融合的原因	60
夏文化的发祥地不是河南而是晋南	52	旧中国三种资本主义的不同作用	60
周代祭祀的礼治教化作用	52	洋务派官僚集团阻挠了中国新式企业的发动	61
周平王东迁是为了避秦	53	洋务派是儒学传统的继承者	61
车战是春秋时期主要的作战手段	53	晚清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性质演变	62
皇权土地所有制是东汉宦官集团的社会基础	54	《天演论》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影响	62
《隆中对》的失误之处在于“跨有荆益”的幻想	55	张之洞在戊戌变法中的作用	62
魏晋南北朝都督制加剧了外重内轻	55	章太炎对近代民族文化的贡献	63
昭武九姓的活动区域	56	清末“新政”的性质	64
波斯军与波斯道	56	护国运动的历史功绩	64
南宋时期商人才取得“齐民”资格	57	“废督裁兵”运动的意义	65
蒙古汗国的盟誓是共同契约	57	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	65

民国时期关税自主的历史		的原因	71
意义	66	“世界中世纪”这个概念不能成立	72
辽河流域也是我国远古文化发源地之一	66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	72
彩陶盆舞蹈图案是祈丰或庆祝宗教仪式的活动	67	反共产国际协定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形成和爆发的标志	73
二里头类型文化是夏文化	67	“二战”初期意大利采取“非交战”立场原因	73
襄阳楚墓是楚国势力扩展的明证	68	斯大林1931年的信及苏联思想文化体制的弊端	73
卜辞断代要注意出土层位	68	1937年国大党的错误政策是导致印巴分离的原因之一	74
白族历史上并无本民族文字——“白文”	69	甘地是印度农民小生产者的代表	74
黄土地区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古建筑的特点	69	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历史意义	75
“五兵”是一切兵器的泛称	70	卡德纳斯改革有深远影响	75
汤因比体系的思辨性	70		
朗克史学的特点	71		
亚历山大从印度河流域撤军			

学 术 动 向	我国史学界 1987 年拟召开的部分学术讨论会一览	76
	中国海关史研究中心研究规划实施情况	连心豪 78
	秦汉史料和史学史研究的新进展	巾 山 79
	秦汉史研究会派会员考察秦汉长城遗址	华 文 80
	苏州大学历史系组织《六朝史稿》的编写	张承宗 81

学 会 活 动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近两年活动简况	童 超 82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活动简况	陶飞亚 83

史 籍 出 版	人民出版社 1987 年中国历史著作出版情况	何 史	85
	中华书局 1987 年度史学书籍出版简况	任 可	86
	1987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历史读物展示	王有为	87
	岳麓书社史籍出版一览	正 平	88
	近年来台湾地方史著作、资料出版概况		89
	《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出版情况	李世愉	90
	出版简讯五则		92

• 书 讯

考古学专题六讲(93) 中国考古学研究(81) 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93) 信阳楚墓(93) 叶德辉评传(93) 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四分册〕(94) 世界现代简史(115) 外国历史名人传〔补遗本〕(84) 克鲁泡特金传(94) 日本史论文集(35) 战争狂人——东条英机(109)

台 港 史 讯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学术研究	
	简述(上)	学 林 95
	台港地区研究中共党史的机构及其资料收藏	97

• 国外史学动向

苏联学者论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

标志	西 江	98
日本中国古代史研究近况	金 山	99
近年日本学者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	金 山	100
美国对中国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研究	何 边	100
日本关于“南京大屠杀”评价的动向	金 山	102
抗战时期美国在中英香港问题交涉中作用之		
新见	艾 逊	103
美国的朝鲜战争研究	杨 明	103
英美关于俄国资产阶级的研究	金 山	104
国外的敦煌写本收藏及流传情况(续完)	临 文	105

• 国外史学流派及史学机构

法国“年鉴学派”的基本特征.....	彭 卫	107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及其成果举要.....	彭 卫	108
日本的辛亥革命研究会和孙文研究会.....		109

• 国外书讯

律令制——中国朝鲜的法与国家(110) 文政九年漂流到远州的得泰船资料(110) 江户时期接受中国文化的研究(110) 五颜六色的百日维新：戊戌时期的人物、政治与思想(111) 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问题和评价(111) 中日战争期间的鸦片政策(111) 古代的日本——以邪马台国为中心(112) 东印度公司简史〔1599—1875〕(112) 西方的经历：至1715年(113) 1500—1980年的资本主义史(113) 国际政治与中东(106)

• 国外史学家

罗米拉·塔帕.....	114
大庭脩.....	114
西嶋定生.....	115

历史学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116
历史学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118

新书书目.....	123
论文索引.....	128

史学理论和史学改革

· 陈启能

1979年以来,随着历史学的复兴,史学界对理论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数量众多的论文到各种规模的学术讨论会,从专题论文集的编辑到多种《史学概论》的出版,都能说明这一点。总的说来,这几年的史学理论研究,表现得比较活跃,有生气。无论从讨论问题的面或者讨论的深度上,也无论从发表作品的数量或者质量上,都比以前扩大和提高。“左”的思想的影响,教条主义的习气有所克服。在新方法的运用和新领域的开拓方面,出现了初步的尝试。这些都是积极的方面。但另一方面,研究还不够深入,很多问题还停留在一般的或概念的讨论上,缺乏对理论问题本身的具体研究和运用新的理论、方法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著作,尤其缺乏有突破性的力作。比起经济学界、文学

界、哲学界来,史学界在理论上的探索和开拓,显得相对逊色。反映在整个历史研究上,传统的束缚和影响还比较明显,选题和方法比较陈旧,对国外史学发展的情况了解不多,还没有根本打破隔绝、闭塞的状况。史学的这种现状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和不满,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尽管在是否存在“史学危机”和怎样取得突破的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似乎比较一致:必须加强史学理论的研究,这至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

为了加强今后的研究,必须回顾已经走过的路程。这里初步

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供讨论时参考。

任何理论的发展,除了学科本身的需要以外,根本的还在于现实生活的推动。马克思早就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根本上说,正是新时期的需要推动了史学理论的发展;反过来也一样,史学理论发展的不足,正是由于没有很好满足新时期的发展需要。

在新时期的初期,重要的任务是拨乱反正,对十年动乱和过去“左”的错误从理论上进行反思。这在史学理论的研究上也有反映。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争论。十年动乱中,封建主义影响触目惊心的暴露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擦亮了人们的眼睛,提高了人们对这个问题严重性的认识。因而,从理论上追溯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主义尤其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就是很自然的了。这段时期,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争论,从各个角度作了探讨。内容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与农民战争的关系,与外部游牧民族侵扰的关系,与地理条件的关系,与小农经济的关系,与地主经济的关系,与封建经济结构的关系,与封建专制主义的关系,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中国封建社会是否完成封建化的问题等等。可以说,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都存在着不同的或者对立的观点,又都无法取得一致。除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展开的讨论比较充分、比较集中以外,还有一些别的争论问题,虽然与现实的关系看起来不这么直接,实际上至少也是一种曲折的反映,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可惜关于这个问题,自从1981年4月举行过学术讨论会以后,没有再进行有组织的集中讨论。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开展和经济改革的提上日程,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就变得更为突出和尖锐。这个问题本身成了争论的对象。1984年11月武汉史学理论讨论会上就曾专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讨论过这个问题。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但看来还是有一些共同的认识的。大家普遍感觉到，象过去那样简单、机械地理解史学为政治服务是不可取的，至于“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搞“影射史学”则完全应该推倒；可是，另一方面，史学又必须适应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必须适应社会和人的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并尽力满足随之而来的新的需求。很难设想，如果不改变以阶级斗争为主的传统的题材范围，如果不革新单纯的叙事、描绘的传统方法，史学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繁荣昌盛。这种认识由于随开放政策而来的对国外史学发展情况介绍的增多而得以深化。由此而出现了关于“史学危机”的争论，关于历史科学社会功能、社会价值的讨论，关于史学与“三论”的关系乃至关于一般史学方法论问题的探讨等。这些似应看作是广大史学工作者对目前史学状况不满足和努力寻求改善办法的一个反映。另一个反映是，同现代化建设直接有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得到了重视，有的甚至争论得很热烈。其中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文化史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和作用以及所谓“国民性”的问题。另一个是各国现代化史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中外现代化史的比较研究。这个问题在国外研究得比较多，在我国还刚刚起步。这里面有不少理论问题。

然而，总的说来，史学如何更好地满足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还是一个有待在认识上和实践中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有人提出来要强调研究同现实有关的问题，要创造条件鼓励进行这样的研究；也有人提出要开拓新领域，研究新问题；另外一些人特别强调要革新研究方法，特别是要引进自然科学方法，等等。所有这些主张和做法都是可取的，尽管在具体实践中还会存在许多问题。不过，应该指出，仅仅这些方面看来还不能完全解决史学适应现实需求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史学本身的改革，或者说史学本身的现代化问题。这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大问题，

这里只简单的说几句。

史学本身的改革或现代化，并不只是一个引进自然科学方法（譬如“三论”）的问题，而应该是全面的。这里顺便说一句，国内把“三论”问题提得这么突出，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用不用“三论”几乎就是新旧史学唯一的至少是主要的分界线。对此我总觉得不甚妥当。我并不是反对“三论”，但觉得如果太突出“三论”，反而把史学的改革问题简单化了，而且这同国外的史学发展情况也并不相符。

史学的改革或现代化，是社会和人的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又促进后者。社会和人的现代化，经济的现代化，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变革过程。邓小平同志把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改革称之为“第二次革命”，这话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在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社会和人的各个方面都会发生深刻的变化，出现许多新的问题。在我国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又会出现许多适合我国情况的特有的新问题，有别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我国的史学自身必须变革。因为它是改革中的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随之改革；而它为了适应改革中的种种变化并满足其需要，也只有改革。这种改革应该是全面的，包括史学思想、课题领域、理论方法、研究手段等等；但又必然是渐进的、稳妥的，不能简单地否定过去的史学传统。

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史学发展的得失是很有必要的。譬如，在国外史学的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现象：史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社会科学学科）日益渗透、溶合、交叉，出现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这个趋势同社会本身的发展以及现实生活中许多新问题的涌现是密切相关的。例如，由于社会问题、人口问题、生态问题、心理问题的日益尖锐化，人们在考察这些问题时必然要追溯它们的历史。然而，在这里，单靠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心理学是不够的，而单靠史学同样也无能为力。因此，两者的结合、渗透就势在必行，从而就产生了社会历史学、历史

人口学、生态史和心态史。这个过程在近二十多年来的苏联史学发展中也已经出现,可以预料,在我国同样是避免不了的。不过,我们目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别的不说,单单科研体制就很不适应这种综合研究的开展。因而,谈到学科的改革,也必须包括科研体制的改革在内。

历史学要进行改革,就离不开对它自身的理论问题的研究,而这恰恰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回顾一下 1979 年以来我国史学界的理论研究状况,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几年争论的问题,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很多都同历史唯物主义有关,譬如社会形态问题、历史动力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讨论,虽然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说明了理论思想的活跃,并表明过去对历史唯物主义比较机械、教条的理解有所突破。例如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讨论,历时两年多,总共发表讨论文章两百多篇,涉及的问题相当广泛,围绕的中心问题是:阶级斗争是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和诸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关系如何。在这个问题和其他问题的讨论中,都提出了许多有启发性的新思想,至少说明在对问题的理解上比过去大大前进了一步。另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学理论的关系问题,在多次讨论会上也有涉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但不能代替历史学本身的理论。这在认识上比起过去是一大进步。我们注意到,苏联史学理论的发展也是在六十年代明确了这个问题以后而获得迅速发展的。然而,仅仅停留在这一认识上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解决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历史学理论应包含哪些内容的问题,并在具体研究上取得成果。这有待我国史学界作出努力。

这些年来,除了同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的问题以外,对别的一些理论问题也展开了讨论。如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历史研究方法问题,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史问题等

等。在这些讨论中,同样提出了许多新鲜的看法,这些无疑是应该肯定的。但从整体来看,这些年来史学界的理论问题的讨论也有不足之处。比较显著的一个不足是,所有讨论的问题,不管是同历史唯物主义有关的问题,或者其他问题,大都是人类社会客观发展过程中的理论问题。苏联有称之为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的,我们权且称为历史理论问题。然而关于历史学本身的理论问题,也就是把历史学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问题,却很少涉及。这类问题在苏联称为历史认识的理论问题,我们暂且叫做史学理论问题。也就是说,近些年来我们主要研究的是历史理论问题,而不是史学理论问题。

当然,今后我们对历史理论问题还需要继续加强研究,但与此同时,为了填补空白,对史学理论的研究应给以特别的重视。这里面的困难可以想见是不会少的,有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譬如,首先就要弄清楚史学理论包括哪些内容,同历史理论的关系如何,研究工作应该怎样开展等等。此外,还要注意把史学理论的研究与批判继承我国史学的传统结合起来,还有一个批判吸收国外史学理论的问题。这里有必要强调一下,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对历史学本身的理论,对历史认识论、方法论的研究很早就已开始,尽管其中有许多唯心主义的糟粕,但应该承认也有许多有益的养分。过去,我们对国外的史学理论介绍得比较零碎,缺乏研究,这对我国的史学的发展是不利的,也不能适应当前开放、改革的形势要求。

我国史学界在理论问题的研究方面已经出现了好的势头,有了可喜的开端。我们相信,在发扬现有成绩和注意弥补不足的基础上,今后一定会取得更大成绩。这里有两点似乎有必要强调一下。一是要特别注意对新生力量的培养和扶植,具体措施能跟上;二是要多做具体的研究工作,尽快从概念的探讨、重要性的议论转到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来,多出成果,快出成果。这样才有利于史学理论研究蓬勃开展的新局面早日到来。

略谈近年来

中国史学研究的若干变化

• 鲁 生 •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短短的八年中，我国城乡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与这个伟大变革相伴随，在学术领域也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史学领域虽然还谈不上有什么重大的突破，但综观近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变化，至少在以下若干方面颇引人注目。

一、历史学的严肃性、 科学性得到恢复

历史学是一门严肃的科学，通过对历史的探究和思考，可以获得智慧和启迪，从而加深对现实社会的认识 and 未来世界的预测，作出科学的、合乎目的性的行动选择，更加自觉地创造历史。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左”的失误，三中全会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历史学的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使得本

来是丰富多样，不断发展、创新的历史学，变成了一种凝固的、僵化的死板模式。“文革”时期，林彪、四人帮把历史学作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的工具，在“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历史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等口号标榜下，完全阉割历史学的科学性，不惜歪曲和篡改历史事实，以达到其罪恶的政治目的，终于发生恣意嘲弄历史，践踏历史科学的历史悲剧。这时的历史学已经不成其为历史学，而是成为政治的工具和附庸。

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界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经过对史学的功能、现代史学的特点、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多数史学工作者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认为学术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历史学同样离不开一定

的社会条件，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极其多样的，功能是多元的，并不仅仅局限于为政治服务。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统一起来，合理调整和完善自身结构，在科学分析研究历史课题的基础上，为现实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和借鉴。历史学不再是简单地、机械地注解、诠释现实政治的工具，更不再是政治的奴仆，其严肃性和科学性正在逐步得到恢复。

二、实事求是学风的树立

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破坏无遗。个人迷信盛兴，教条主义泛滥，实用主义猖獗，严重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历史科学的声誉。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界拨乱反正的首要任务就是坚持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恢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经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通过一系列的学术

实践和自由讨论，使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得到恢复和发扬。首先，人们打破了教条主义枷锁，不再把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导师的一切言论都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加以套用，也不再用现成的理论模式去机械地框定历史，而是尊重历史事实，认真探究规律，在探索 and 开拓的实践中，丰富历史学的内容。其次，摆脱了实用主义桎梏，清除了“影射史学”的流毒。“影射史学”是文化专制制度的畸形产物，“文革”十年是“影射史学”猖獗的十年。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局的变化，使得影射史学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环境和土壤，使得广大史学工作者能够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比较公允和客观的评价。如对孔子、吕后、武则天、左宗棠、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是非功过不再一概否定和颂扬；洋务运动的历史作用也不再一笔勾销等。尽管有些“翻案”是否恰当还可以商讨，但这些再研究、再评价本身反映出人们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尽量避免主观、武断和片面性